

烏家培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2 017 4285 5

集選培家烏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乌家培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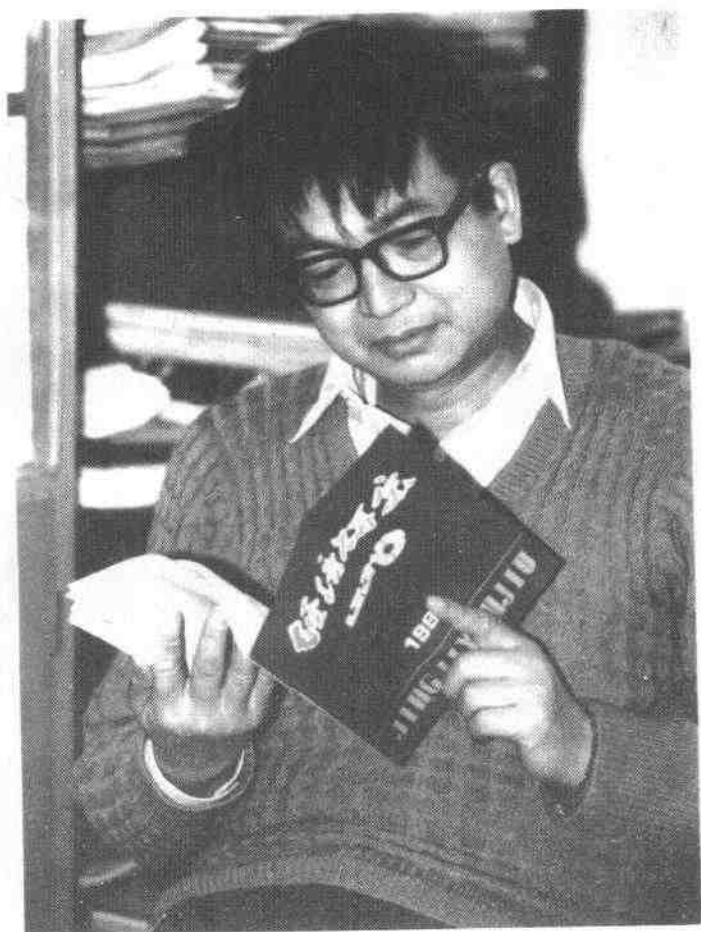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字数: 403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850册

*

书号: 4086·191 定价: (平装)4.10元
(精装)5.80元



数量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

写前语

一、数量经济学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经济学发展的表现

数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有三十多年，在我国历史要短些，充其量为二十多年。数量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时间尚缺以上所述短。

但是，经济数量问题的研究和数量经济学的产生，却是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经济学并不古老，与天文学、物理学等相比，还是年轻的。它的主要部分政治经济学作代表，经济科学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不开的。从1690年出版的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算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算起，也

为需要而研究

——代自传

我生于1932年5月。解放前，由于家庭贫穷，在家乡宁波读完初中后，15岁时就到上海当学徒。先后在两家商店工作，受的剥削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具封建主义色彩。解放后，加入了工会，为工会干部，经工会保送于1951年9月到沈阳进东北计划统计学院的本科学习。该校后改名东北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在统计系学习将近四年，深受宋则行、佟哲晖等老师们的教诲。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上述经济研究所自1959年起归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1978年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在经济研究所整整工作了27年之久。开始时，在苏联专家阿·毕尔曼的指导下研究财政问题，给国务院写过改进流动资金管理方面的内部研究报告和工作条例。过了3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后又转到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我写了几篇理论文章，发表于主要报刊上，参加了当时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大讨论。这些文章的观点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国庆10周年前夕，孙冶方同志提名要我去苏联学习经济数学方法，先到中国科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后因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没有成行，就回到经济研究所自学和研究

经济数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宣传经济数学方法。六十年代初，成立了一个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共3人，由我负责。这个小组设在国民经济平衡研究室内。所以，我还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掌握数学工具，我花了两年时间到中国科技大学学习高等数学和现代数学。在研究经济数学方法方面，孙冶方、于光远同志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孙冶方同志曾用形象的比喻勉励我，说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学习如何运用数学方法，犹如“虎口掏肉”，既要把肉拿到手，又不要为虎所伤。于光远同志曾设想与数学家华罗庚同志合作，共同来推进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实现。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从经济数学方法一般问题的阐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的探讨、部门联系平衡模型的讨论、对经济计量学的剖析等4个方面发表了一批论文，以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陆续写作了好几篇。合在一起，于1978年12月辑录成为《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出版。这本书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学习、宣传和研究经济数学方法的成果。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历史烙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我把经济计量学作广义的理解，偏重于对它的理论基础的批判，而从狭义上理解它，进而探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统计规律性，注意不够。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经济研究所先后负责科研组、计划统计组、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数量经济研究室的工作。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并未迅速恢复。根据所内布置的任务，研究了国民经济管理问题、经济效果问题、地方工业发展问题等等。还组织组内或室内以及所外的同志，集体写作《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讲座》、《常州工业发展的道路》等，前者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国

内广大听众和读者的良好反应，并受到了理论界和经济部门的重视。在我发表的关于经济效果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论文中，提出了经济效果是所费与所得的比较关系，它在不同社会既有了一般内容又有特殊实质、经济效果的评论标准和经济原则的正确表述、经济效果是衡量管理水平的标志而经济管理是决定经济效果好坏的因素等一系列观点。

1978年春，在北京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上，要求恢复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并与其他经济学科一样，对经济数学方法也制订了全国三年（1978—1980）、八年（1978—1985）规划的设想和建议。会议期间，根据于光远同志的建议，由我负责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1979年春，又在于光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下，邀集全国几十名学者，把经济数学方法改名为数量经济学，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并且讨论了建设数量经济学的有关问题。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在第一、二两届年会上，我被选为理事长。

1980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领导，派我去美国进修学习，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任访问学者期间，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的指点，得益匪浅。留美期内，我写成了《经济数量分析概论》一书。回国前3个月，在福特基金会和克莱因教授的支持下，走访了美国的和国外的14个主要研究中心和5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叫《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

1982年2月回国后，接受了马洪同志交办的两项任务。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负责筹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至1985年9月筹备结束，任务完成。二是到常州编写《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常州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这是赵紫阳

总理1982年1月中旬到常州视察时提出来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1983年5月书成出版。

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主编了《数量经济理论、模型和预测》一书，写作了《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一书，还与其他同志合编了《经济技术协作新发展》一书。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中，我负责承担“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与其他同志合作，先后编著了《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经济模型及其运用》、《经济模型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等书，还编译了《外国宏观经济模型译文选集》一书。在该课题的范围内，我还组织所内同志与外单位合作，研制了8个宏观经济模型：参加克莱因教授主持的Link Project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参加联合国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联结项目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年度宏观经济调节模型。

由于领导上交给我的研究任务经常变动，加上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我研究和写作的范围相对地宽一些，但重点仍在数量经济学方面。

仅就数量经济学而言，虽然我写过不少书文，但是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我经常为这两方面都极其有限而自叹。尽管如此，我没有理由气馁，相反，国家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发展的需要，唤起了我的一种责任感，决心竭尽全力，在学习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学习，为把我国数量经济学与整个经济科学推向前进，献出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这就是我的心愿。

乌家培

1986年5月14日

目 录

为需要而研究

——代自传

经济学理论与科学发展问题

规律是不能被消灭的·····	(3)
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	(14)
“按劳分配”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	(23)
论基本折旧基金的使用构成·····	(28)
论经济数量关系·····	(35)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53)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体会	
向挖潜、革新、改造要速度·····	(68)
当代科技进步与经济研究·····	(72)
经济理论的两种研究方法及其关系·····	(77)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强大潮流·····	(80)
谈交叉科学发展的原因和途径·····	(94)
要造就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98)

再生产理论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伟大发展·····	(105)
---------------------	---------

——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理论的体会

也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	(120)
——与张熏华同志商榷	
平衡、平衡法、平衡表·····	(136)
部门联系平衡的理论与方法论·····	(148)
关于在山西省试编部门联系平衡表条件的考察 报告·····	(181)

经济效果与经济管理问题

经济效果与经济管理·····	(203)
改进国民经济管理与提高经济效果·····	(209)
关于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	(221)
关于费用效益分析·····	(236)
要联系经济改革研究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	(245)
论投资效果指标体系·····	(248)
用投入产出观念搞活经济·····	(272)
管理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	(275)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管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研究和组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经济 管理中应用的一些问题·····	(286)
信息是管理的基础·····	(292)

专业化与协作问题

广泛实行专业化协作·····	(299)
常州市组织产品一条龙协作的经验好·····	(304)
专业化协作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317)

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专业化协作·····	(328)
经济技术协作的实质、原则和作用·····	(349)

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问题

谈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的关系·····	(365)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375)
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393)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科学的发展·····	(403)
经济体制改革与数量经济学·····	(413)
开展企业数量经济学的研究·····	(422)
关于数量经济学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问题·····	(431)
经济数学方法的主要内容·····	(438)
经济数学模型概述·····	(446)
谈产业部门规划模型的重要性·····	(470)
世界经济模型的发展和我国经济模型的研究·····	(473)
关于经济系统分析·····	(481)
谈经济控制论·····	(493)
控制论与控制理论的异同·····	(501)
更好地推广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	(504)
从西方经济计量学的经历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511)
应当重视“投入产出法”的利用·····	(518)
把投入产出法的应用推进一步·····	(521)
关于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528)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541)
附录：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目录 ·····	(549)
后记·····	(552)

经济学理论与科学发展问题

规律是不能被消灭的

德麟同志在《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论点：“规律是可以消灭的”。他认为消灭规律的办法就是：“消灭产生这个规律的前提”。论证这个观点的根据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关于“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其铁的法则”错误提法的一段话；另一个是广大工人和农民正在“消灭”所谓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的规律。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论据。德麟同志从马克思对拉萨尔“铁的法则”的整段批评中摘引了如下两句：“如果我废除雇佣劳动，那末自然，我也废除它的法则，不管这些法则是‘铁的’或者象海绵一样是软的。但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却几乎完全是绕着这个所谓法则打圈子。”由此，他认为马克思“明明”告诉我们，规律是可以“废除”的，“废除”的办法就是“废除”产生这个规律的前提。

由于原文较长，不宜全引，可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26—28页及第38—39页。如果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的第二部分意见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致奥·倍倍尔的信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德麟同志不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来理解上引这段话的。

第一，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废除”两字，显然是借用德

国工人党纲领条文中的原话，不能由此而认为马克思说法则是可以“废除”的。相反，马克思却认为拉萨尔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其铁的法则”是“胡言乱语”。

第二，拉萨尔把“工资的铁的法则”强加在德国工人党身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拉萨尔的“铁的法则”是以“荒谬的论据”为基础的“荒谬的原理”，“这个法则的基础就是下述完全陈腐了的经济学观点：仿佛工人平均只得到工资的最低限额，这就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说法——工人总是过剩的（拉萨尔的论据就是如此）。”马克思说：“如果我接受那带有拉萨尔戳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的法则，那末我也不得不接受该法则的拉萨尔论据。”“倘若这个理论（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者注）是正确的，那末，我甚至一百次废除雇佣劳动，也无论如何不能废除“铁的法则”。最后还说：“且完全不说拉萨尔对这个法则的错误了解，而下述情况（指拉萨尔的教条侵犯了广佈在党员群众中的见解——引者注）总是一种真正可恶的退步。”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承认更没有接受拉萨尔的“铁的法则”，那末又何从谈起“废除”这个法则呢？！

第三，拉萨尔不去切实地进行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却几乎完全是绕着这个所谓法则打圈子”。马克思为了进一步批判这种有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指出首先要废除残酷的奴隶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被废除之后，那末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法则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我废除雇佣劳动，那末自然，我也废除它的法则，不管这些法则是‘铁的’或者像海绵一样是软的。”马克思这句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第四，当马克思讲“废除雇佣劳动”时，丝毫没有离开或违背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反，他正是由于深刻地揭示了和科学地依据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才号召工人们不要只限于进行游击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后果，而要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所写的意见中不能得出德麟同志的结论，即通过消灭产生规律的前提的办法可以消灭规律。这是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解。此种误解乃是不从精神实质而从字面意义按照个人“需要”去理解经典著作的结果。

其次，我们再考察第二个论据。德麟同志认为：所谓“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的规律（即通常所称的物质利益原则）有个前提，那就是“劳动群众的觉悟还不高，还存在着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思想”。因此，如果用开展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方法，把大多数劳动者变成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我们也就“消灭”了这条似乎不可侵犯的规律。为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起见，德麟同志武断地肯定：“过去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广大的革命干部消灭了这条规律；现在广大的工人、农民正在消灭这条规律。”

从这里可以看出，德麟同志对物质利益原则的存在原因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无作用的认识是模糊的。他简单地认为物质鼓励只是对思想落后和觉悟不高的人才适用的，它会妨碍我们迅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应当创造条件，使它归于消灭”。前些时期在讨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我们在本文范围内比较详细地申述这个问题，至于对物质利益原则的全面探讨则留待另文论述。